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一輯

龔鵬程 主編

第5冊

魏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下）

朱雅琪 著

新學
嚴
飛
聲
PDF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魏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下) / 朱雅琪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目 6+172 面：17×24 公分（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一輯；第 5 冊）

ISBN-13：978-986-7128-92-8（全套：精裝）

ISBN-13：978-986-7128-78-2（精裝）

1. 中國詩－歷史－魏晉南北朝（220-588）2. 中國詩－評論

820.9103

96003129

ISBN 986712878-2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一輯 第五冊

ISBN：978-986-7128-78-2

魏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下)

作 者 朱雅琪

主 編 龔鵬程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3 月

定 價 第一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魏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下）

朱雅琪 著





目

錄

上 冊

第一章 導論 —— 建構一個投置於文化視域中的詩歌美學理論.....	1
第一節 魏晉詩歌美學凝視的意義.....	1
第二節 從歷史觀照中建構詩歌美學研究的「審美意識內核」.....	10
第三節 「脈絡」的爬梳與「意義」的編織.....	21
第二章 建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 —— 離亂世界的悲憫與永恆人倫的企求.....	29
第一節 鄴下文士統治集團的崛起與詩歌創作意義的轉變.....	29
一、漢末政治社會的動盪及鄴下文士統治集團的崛起.....	29
二、鄴下文士集團獨特的生活世界及其文學表徵.....	36
三、詩歌成為「情志展現」與「審美意識馳騁」的最主要場域.....	42
第二節 文氣論中所開展的美學向度及其對詩歌美學的影響.....	45
一、以「氣」為主文論的出現及其傳統.....	45
二、曹丕文氣論中所開展的美學向度.....	50

三、「壯密」之氣的審美風格體現及其對詩歌創作的影響	54
第三節 鄴下文士戲遊生活及詩作中所開顯的美學境界	57
一、戲遊詩作中的審美品類及境界	57
二、戲遊詩作中的和諧隱喻及其政治社會功能	61
第四節 離亂中的詩情及其對永恆人倫之美的企求	67
一、情、志合一趨勢下「哀時言志」的新主題	67
二、企盼中以人倫禮樂為本的理想美學境界	71
三、植基於「離亂流逝」的現實經驗而臻「明朗剛健」的美感	77
第五節 發揚顯露、麗句滋多的詩美觀	83
一、從「通脫質樸」以迄「壯麗」的審美風格	83
二、「文質之辯」及其在詩歌創作藝術風格的展現	88
第六節 曹植後期詩歌的美學展現	93
一、曹植後期獨特的生命轉折以及詩歌創作對他的意義	93
二、曹植後期詩歌中所展現的審美意識	101
第三章 正始詩歌中的審美意識 —— 憂悶情感的奔騰與內在理境的超越	109
第一節 玄學興起的政治社會作用與詩歌創作角色的改變	109
一、玄學興起的社會作用及其政治理想	109
二、玄虛相尚的清談社交及其所開展的審美向度	115
三、詩歌創作成為玄學的附庸	120
第二節 玄言思辨滲透下的詩歌美學	122
一、玄學「貴無」的審美理想及其對詩歌創作的影響	122

二、從王弼論「大音希聲」以迄嵇康論「聲無哀樂」的美學啓發·····	127
第三節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審美意境與創作風格·····	132
一、嵇康、阮籍孤獨的生命現實及其詩歌創作所開展的「憂悶」美感·····	132
二、嵇康、阮籍詩歌創作所開顯的超越性審美境界·····	137
三、竹林名士對「超時空」內在自由境界的追求·····	142
第四節 玄學影響下詩歌創作的美學原則及書寫進路·····	145
一、玄學中的「言、意」之辯及其對詩歌藝文創作的影響·····	145
二、阮籍與嵇康在「言不盡意」下的詩歌審美實踐與落差·····	150
第四章 西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 —— 細怨美感的投射與自然宏麗的展現·····	157
第一節 西晉政治社會的傾軋及詩歌創作意義的改變·····	157
一、周旋於皇權與世族政治傾軋下的「素族」文士·····	157
二、素族文士儒、玄揉合的心態結構及其對文學的影響·····	162
三、詩歌成為仕進的工具或自娛的遊戲·····	167
第二節 陸機〈文賦〉的出現及其所開展的美學理論·····	171
一、〈文賦〉中所展現的時代意義——儒玄揉合思想下對詩歌等「文學」進行想像的「理論」著述·····	171
二、「詩緣情而綺靡」所呈顯的美學世界及其對詩歌創作的影響·····	173
第三節 素族文士遊宦羈旅生活中的審美經驗·····	184
一、素族文士的日常社會生活結構及其特質·····	184

二、素族文士的審美姿態與品類	188
三、素族文士以世俗私我情感爲主的細怨審美內涵	197
第四節 天道宇宙自然的宏麗之美	200
一、感物論與西晉文士的自然觀	200
二、西晉詩人以描繪自然圖式作爲對現實的永恆逃避	204
三、西晉詩人以描繪自然圖式所展現的「宏麗／至麗」之美	207
第五節 太康詩歌所展現的藝術風格及其創作進路	211
一、西晉詩歌創作的「準形式主義」傾向及其成因	211
二、「高雅綺麗」的藝術風格及其書寫進路	214

下 冊

第五章 東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 —— 即色游玄的陶醉與風神調暢的向慕	221
第一節 江左門閥政治的確立與詩歌美學創作意義的轉變	221
一、江左偏安態勢的形成以及門閥政治權力運作的確立	221
二、清談雅賞社交生活下詩歌作爲一種美學實踐的新意義	228
第二節 山水園林中的「詩意棲居」及其所建構的美學姿態與品味	235
一、「發現」山水之美	235
二、莊園經濟及園林時空的第二自然建構	240
三、「異質地方」中的詩意棲居及其所開顯的美學品味	247
第三節 玄學等文化論述及其對詩歌創作的美學影響	255
一、玄學的純粹化、佛學化及其對玄言詩發展的美學影響	255

二、「傳神寫照」等藝術論述的滋生及其所開展的美學向度	263
三、葛洪《抱朴子》中所參照折射的文學美學論述	271
第四節 「即色游玄」所透顯的審美經驗	280
一、世族名士「名教」、「自然」合一的理想人格模式	280
二、山水與人物的「自然」成為審美的最重要品類	284
三、「理境」玄悟的審美經驗與觀照	289
第五節 風神之美的「自然」企求	302
一、人格哲學建構的美學影響	302
二、佛學「形盡神不滅」論述對形神關係的詮釋及其影響	307
三、「形神自然」的審美理想	312
第六節 東晉詩歌的詩美觀及其書寫進路	321
一、玄學影響下的詩美觀及藝術原則	321
二、「名理」與「奇藻」	325
第七節 晉宋之際詩歌發展的新趨勢及陶淵明的美學變調	334
一、晉宋之際的社會歷史脈絡及詩歌美學的新趨勢	334
二、陶淵明生命中「出」與「處」的矛盾及其歸隱田園的意義	337
三、陶淵明詩歌回歸田園「沖淡」之美的審美向度	342
第六章 結論 —— 存在真理的詩性開顯：魏晉詩歌實踐的審美自覺	347
參考書目	373

第五章 東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 —— 即色游玄的陶醉與風神調暢 的向慕

第一節 江左門閥政治的確立與詩歌美學創作意義的 轉變

一、江左偏安態勢的形成以及門閥政治權力運作的確立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世說新語·寵禮》）

天子正會，百官朝儀，該是何等威武風光之事，然而晉元帝司馬睿卻一再牽引宰相王導共登御床，演出了一場君臣間彼此推辭的戲碼。王導雖然固辭不就，並說出了「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的謙讓話語，但從天子待之以殊禮、不敢視其為臣僚的互動過程，不難看出晉室在南渡之後，皇室與世族間的權力關係已然有了根本的改變。這除了可從前述正會牽引之事略窺端倪外，亦展現在元帝素以「仲父」尊稱王導的事例上〔註1〕；其後，成帝則曾經親臨王導

〔註1〕《晉書·王導傳》。

宅第、拜會王導之妻〔註2〕，且他下手詔給王導，更出現「惶恐言」與「頓首言」等下對上的字眼〔註3〕。可見，西晉之際司馬氏面對世族時高高在上的姿態已然不再，代之而起的是皇室與當權世族間的平起平坐，難怪史書會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記載：

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

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註4〕

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註5〕

這意味了東晉門閥政治的出現，也透露了世族已然躍居權力的高峰，不僅成了實際政治的掌權者，更成了文化藝術等美學風潮的實踐者與推動者。

西晉皇室的式微，早從八王之亂時即已露出了端倪。東海王司馬越雖獲得了最後的勝利，然經過了長達六載（西元300年～西元307年）的相互征戰，中原地區早已呈現凋弊之狀，給了胡族可趁之機。趁著皇室權力動盪飄搖之際，原先在八王之亂中曾經幫助成都王穎的匈奴、羯人等紛紛叛變，開啓了中國歷史上的「五胡亂華」〔註6〕。面對如此局勢，時任太傅的東海王越雖曾於懷帝永嘉四年（西元310年）十一月親自率軍出戰，並於次年師駐項（河南項城縣東北），期盼能討伐來犯的匈奴劉曜、王彌與羯族石勒〔註7〕，然卻不幸於永嘉

〔註2〕《晉書·孔愉傳附孔坦傳》；《晉書·天文志》。

〔註3〕「惶恐言」見《晉書·王導傳》；「頓首言」見《晉書·荀勗傳附荀奕傳》。

〔註4〕《晉書·王敦傳》。

〔註5〕《南史·王弘傳》。

〔註6〕五胡亂華起始於晉惠帝永寧元年（西元301年）巴氏的李特之亂，至永興元年（西元304年）匈奴劉淵起兵於左國城（山西離石縣東北）後而勢遂盛。參閱林瑞翰《魏晉南北朝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79年5月初版，頁206。

〔註7〕匈奴劉曜、王彌與羯族石勒皆爲漢主劉聰之部將。

五年三月逝世。爾後其部眾在王衍的領軍下，隨即陷入了多舛的命運，於該年四月爲石勒追擊於苦縣寧平城（河南鹿邑縣西南），而在騎兵圍射下，造成了數十萬眾自相踐踏、死者有如山積的悲慘下場。隨著王衍的潰敗，洛陽亦發生了饑荒，不久爲漢主劉聰所攻陷，懷帝也被擄至平陽，而於永嘉七年二月遇害，此即著名的「永嘉之亂」。西晉諸將雖於永嘉六年奉秦王司馬鄴到長安，並於次年懷帝遇害後立爲天子（即爲晉愍帝），改元建興，但長安於建興四年（西元316年）十一月亦被劉曜攻陷，愍帝肉袒銜璧輿襯出降，西晉終於走入了歷史。而就在西晉逐漸衰亡之際，琅邪王司馬睿已奉東海王越之令，於永嘉元年（西元307年）九月來到了江南一帶，並在王導恩威並濟政策的協助下，逐漸拉攏並擺平了吳郡地方的世族，爲北人政權在江南的建立掃除了障礙〔註8〕。直到愍帝於平陽遇害後（西元318年），司馬睿終於接受了群臣的勸進，於建康即帝位，改元太興，從此開啓了東晉百餘年來在江左偏安的政治局面〔註9〕。

東晉政權的建立，乃是在內憂外患的過程中完成的。除了來自江北劉聰、劉曜、石勒等胡人勢力的威脅外〔註10〕，渡江前後，江

〔註8〕 參見何啓民〈東晉時代的南北族群問題〉。《歷史月刊》九十四期，民國84年11月，頁31～頁36。

〔註9〕 東晉皇帝依序爲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廢帝、簡文帝、孝武帝、安帝與恭帝十一人。至於本段所敘史實請參閱林瑞翰《魏晉南北朝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79年5月初版，以及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初版。

〔註10〕 「漢」自晉惠帝永興元年（西元304年）劉淵即漢王之位，歷劉和、劉聰、劉粲、劉曜而改國號爲「趙」（爲「前趙」），至東晉成帝咸和四年（西元329年）而國滅，總共經歷了六主，享國二十六年。「後趙」自石勒於東晉元帝太興二年（西元319年）僭號（於東晉成帝咸和四年（西元329年）擊滅「前趙」），至晉穆帝永和六年（西元350年）爲冉閔所滅（國號大魏，歷三年而亡），總共經歷六主，享國三十二年。五胡十六國中，勢力雄厚而佔有中原者，除「前趙」與「後趙」外，尚有慕容皝的「前燕」、苻堅之「前秦」、慕容垂之「後燕」、以及姚萇之「後秦」，當時號爲正統。至於國勢較弱而偏

左亦發生了一連串的動亂：例如張昌、陳敏、杜弢與王機等的興風作浪、以及王導的從兄王敦與流民領袖蘇峻等的相繼作亂，帶給了東晉政權沉重的打擊〔註 11〕。在這樣的情況下，江左政權是自顧不暇的，既無能力、也無意願向北揮軍。因此，雖有劉琨與祖逖等愛國志士在北方孤軍奮戰，但終不得完成收復失土的大志。事實上，東晉始終沒能形成舉國一致恢復中原的志願，其間雖曾有庾亮兄弟、殷浩、桓溫與謝玄的幾次北伐，但皆以失敗收場。在此同時，北方亦處於持續的混亂之中，並無力南犯，因此南北雙方維持了一定的均勢。其後，前秦苻堅雖曾統一了北方大部份的地區，並萌發了南侵的意圖，然在孝武帝太元八年（西元 383 年）淝水之戰為謝安、謝玄所帶領的北府軍擊敗後，其統一之夢想終於煙消雲散。從此，南北均衡對峙的態勢愈發地鞏固，直到隋文帝楊堅興起後，方才打破了南北分裂的狀態，重新統一了中國。

誠如田余慶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指出，東晉政權得以在江左維持偏安的局面，門閥世族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前引「王與馬，共天下」的話語即是明顯的例證〔註 12〕。然而「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並非始自南渡之後，早在八王之亂結束後，不具備皇室近親名份〔註 13〕、號召力有限的東海王司馬越為了維繫其統

居一隅者，則有張軌的「前涼」、李暠的「西涼」、沮渠蒙遜的「北涼」、呂光的「後涼」、禿髮烏孤的「南涼」、赫連勃勃的「夏」、乞伏國仁的「西秦」、李雄的「成」（李壽改國號為「漢」，史稱「成漢」）、馮跋的「北燕」以及慕容德的「南燕」等。其中，除了「前涼」、「西涼」與「北燕」為漢人所建外，其餘者，皆為匈奴、羯、氐、羌與鮮卑五胡族所建。

〔註 11〕 參見勞幹《魏晉南北朝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 80 年 6 月二版；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1 月初版；陶希聖〈東晉之世族名士與州郡權力〉，《食貨月刊》第四卷第七期，民國 63 年 10 月，頁 269～頁 292。

〔註 12〕 參見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1 月初版，頁 1～頁 38。

〔註 13〕 最後參與八王亂事的司馬越，乃是司馬懿弟東武城侯司馬暉之孫，高

治，即找上了素有盛名、又具有地域近鄰關係的琅邪名士王衍〔註14〕，共同撐起了一個風雨飄搖的末代朝廷。可以說，惠帝末年和懷帝時期的西晉朝廷，即是一種以司馬越與王衍為核心、而由世族名士妝點其間的政治局勢。其與司馬睿及王導在徐州下邳的關係，皆是後來建康「王與馬，共天下」的前奏。然而西晉末年王與馬的結合，主導者仍是皇族司馬越，王衍與眾名士只是其附庸，主要用以妝點朝堂，協助其治理洛陽朝政，並沒有改變西晉自建國以來皇權凌駕宗族的傳統格局〔註15〕。

王與馬結合的關係，一直到了江左才產生了根本的變化。誠如田余慶分析者，琅邪王司馬睿本來並不具備在江左運作皇權的條件。一來，作為南渡五王〔註16〕之一的他，與西晉自武帝、惠帝、懷帝與愍帝以來一脈相傳的皇統是十分疏遠的，並沒有具備堅強的法統繼承地位；二來，司馬睿在西晉王室中非但沒有威望、實力，

密王司馬泰之子，就血統而言與武帝、惠帝一脈皇統可說是相當地疏遠。

〔註14〕 王衍之郡望雖然不在東海，卻是東海的近鄰，而且其家族的社會地位遠高於東海國境內的任何一個家族。

〔註15〕 歷史上來看，宗族群體及其所依存的宗法制度雖然早在皇權出現之前即已存在，而且在專制皇權出現後得到了大力發展的空間。然而，自從專制皇權出現後，宗族群體基本上即在皇權的掌控之下，從來就不曾出現宗族與皇族平起平坐的狀況。即便在東漢因為皇權旁落而出現外戚與宦官專擅的情況，也只是一種對於皇權的竊取，而非對其之否定。因為，弄權者還是必須假皇帝之名以行事，掌握了（年幼弱小的）皇帝即掌握了一切。當然了，宗族的坐大與皇權在經濟的面向上素來是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的，但由於皇權的存在通常具有庇護宗族的作用，因此只要皇權具有一定的穩定度，一般來說宗族還是相當願意效忠皇室的。有鑑於此，作為知識階層主體以及當朝官員主體的宗族成員，往往是皇權最直接而死心蹋地的擁護者，甚至在皇權式微之際，亦力圖匡復，直到無力回天，方才成為新一階段皇權的角逐者。參見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初版，頁340～頁347。

〔註16〕 其餘四馬為彭城王、汝南王、南頓王與西陽王，皆因為不見容於世族之權臣而罹殺身之禍。

也不見有任何功勞，因此若不借重門閥世族的扶持，在江左根本沒有任何立足的餘地；加以，渡江之初，晉愍帝在長安一隅所代表的正朔還未斷絕，因此只有靠著依附世族的籌碼，方能加重司馬睿在政治上的份量。這時，除了與司馬睿同屬琅邪一地的王敦、王導兄弟已然渡江前來追隨外，原在中朝時依附東海王司馬越的許多僑姓名士，也在時勢催逼下紛紛渡江，投入了司馬睿的陣營。這不僅提供了司馬睿政治運作足夠份量的籌碼，同時也水到渠成地造就了江左一朝的門閥政治〔註17〕。

值得注意的是，晉元帝固有求於僑姓大族的支持，然亡官失守、飽受流離顛沛之苦的南渡世族也需要司馬睿政權所提供的保護，兩者間其實是維持著一種彼此需要、但又互相制衡的關係。一方面，爲了有所托庇，以便立穩腳跟、再行出發，南渡世族固然必須盡力保全司馬睿的朝廷，但卻又不願意見到其真正發揮皇權的威力而限制了他們的發展；另一方面，晉元帝雖說曾經執引王導以共登御床，然而與門閥世族共有神器畢竟不是其心甘情願之事。因此，只得透過一場場政治的傾軋與實力的較量，方才能取得皇權與世族、以及世族與世族之間的平衡〔註18〕。以此觀之，諸如晉元帝之重用劉隗、刁協以抑制王家勢力、以及王敦之聯合王導及沈充等南人共叛晉室，莫不是皇權與世族彼此間相互較勁的最具體展現〔註19〕。經過了這樣的過程，不僅世族取得並鞏固了與皇權共天下的地位，各門戶間也達成了一定的平衡。誠如田余慶所言，從王敦兩次舉兵叛亂，卻獲致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觀之，即可了解這種權力運作的特殊模式：

王敦一叛，以“清君側”即反對劉隗、刁協爲名，得到士族的

〔註17〕 參見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初版。

〔註18〕 除了皇權與世族間之平衡外，亦包括了僑姓世族與吳姓世族、以及僑姓世族之間的平衡。

〔註19〕 參見林瑞翰《魏晉南北朝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79年5月初版，頁244～頁248。

普遍支持，這說明士族在東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權益，是不容皇權侵犯的。王敦再叛，欲取代司馬氏而獨吞江左，以士族共同反對而告失敗，這說明司馬氏皇權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廢棄。歷史的結論是，只有皇權與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維持。所以，本來只是兩晉之際具體條件下形成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暫時局面，就被皇權與士族共同接受，成為東晉一朝門閥政治的模式。此後執政的庾氏、桓氏、謝氏，背景雖各有不同，但都不能違背這一結論，企圖違背的人，都未能得逞。因此，王與馬、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格局延續多年，始終沒有大的變動。（註20）

事實上，主弱臣強成為江左政治的通例，東晉朝廷依序成了以琅邪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等家族為主的政治舞台。觀諸史實，東晉之所以能在江左立國、渡過淝水之危、避開來自北方的威脅，大家族的鼎力支持實是關鍵所在，故政權自然就為其所把持了，何啓民先生謂：「百年以來，政權不出琅琊臨沂王氏、潁川鄱陵庾氏，譙國龍亢桓氏、陳郡陽夏謝氏四家之外，政出私門，權去公家。」（註21）沈約亦稱：「晉自社廟南遷，祿去王室。朝權國命，遞歸臺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註22）。擁有這樣顯貴的政治權力，加上經濟上的優越條件，東晉的世族名士呈現出相當大的人格自由與獨立，十分不同於之前官僚階層必須依附於皇權的狀況。作為世族的一員，他們總是充滿了極度的自信心與優越感，甚至到了南朝之際仍為了自己的血統而自豪不已。在此狀況下，不僅人格獲得了自由、思想獲得了解放，包含了詩歌在內的美學實踐亦走向了自由與解放。

〔註20〕摘引自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初版，頁345。

〔註21〕何啓民〈南朝的門第〉，收於《中古門第論集》。台北：學生書局，民國71年出版，頁130。

〔註22〕《宋書·武帝本紀》史臣語。

二、清談雅賞社交生活下詩歌作為一種美學實踐的新意義

永嘉南渡對原先習於安逸的中土世族所造成的衝擊是相當巨大的。目睹著胡騎的入侵、半壁大好江山的淪陷，世族文士在體會了亡國的切身之痛後，紛紛陷入了一股淒愴與迷惘的情緒之中。例如，衛玠在攜家渡江時，即曾「形神慘悴」〔註23〕地向左右說道：「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註24〕而南渡諸臣更曾出現了對泣新亭的舉動。《世說新語·言語》記載道：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然而，這樣一種惆悵的心緒，卻隨著東晉政權在江左的逐漸穩固而日益消逝了。且經過了一段時日的彼此攻防，不但南方無力統一北方，北方亦無法吞併南方，南北分立的態勢已成定局。這種南北割據態勢的形成，自然而然沖淡了往日諸如新亭對泣的悲愴情緒，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種習於偏安的心態。是以，庾亮欲移鎮石城時，蔡謨會上疏加以反對，並得到了朝中許多人的附和〔註25〕。殷浩北伐，王羲之亦相當不以為然，並親自致書加以阻止。王氏甚至在殷浩徐圖再次北伐之際，勸殷氏應放棄淮河流域而退守長江一線〔註26〕。關於這種一隅偏安的心態，孫綽在反對桓溫北伐的上疏中，表達得至為清楚：

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

〔註23〕《世說新語·言語》。

〔註24〕《世說新語·言語》。

〔註25〕《晉書·蔡謨傳》。

〔註26〕《晉書·王羲之傳》。

江川，僅有達者。〔註27〕

誠如疏中所言，永嘉南渡時初到南地所面臨的人生地不熟窘境已然不再了，一切都已經習以為常了。渡江之後的僑姓世族（尤其是其第二代以後）經過了多年經營，不管是墳墓、生業，還是田宅、舟車，都已經重新在江南找到了安頓。處於這樣習於偏安的歷史脈絡下，他們會將精力轉向內心，尋求一種特屬於閑定安寧的精神慰藉，是十分自然的。羅宗強說道：

南渡一代的悽惻悵惘已成過去，一切都習慣了，……這樣的局面有利於追求安寧、追求平靜。於是走向內心，去尋求另一個廣闊天地，去尋找精神的慰藉。終江左百年，未離這種境界。〔註28〕

綜而觀之，東晉世族名士轉向內心、追求精神寄託的情形是相當普遍的，而這主要是透過清談雅賞社交生活的中介而達成的。從西晉末年開始，士人群體間即出現了一種對清談虛誕士風進行反省的聲音。王衍在臨死前便感嘆說道：「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註29〕劉琨在經歷了亡國之痛後，亦曾反省年少時欲藉由虛無曠達以實現齊物達觀境界的不可取〔註30〕。到了東晉，除了「雅好經史，憎疾玄虛」〔註31〕的虞預曾說「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註32〕外，李充與干寶更分別於〈學箴〉與〈晉紀總論〉中批評

〔註27〕《晉書·孫楚傳附孫綽傳》。

〔註28〕引自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0月初版，頁129。

〔註29〕《晉書·王衍傳》。

〔註30〕劉琨〈答盧湛詩〉之附信：「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轉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悵爾。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

〔註31〕《晉書·虞預傳》。

〔註32〕全上注。